

围不住的围龙屋

记一个客家宗族的复甦

增订本

谢剑 房学嘉 著

花城出版社

围不住的围龙屋

——记一个客家家族的复甦
增订本

房学嘉 谢 剑 著

花 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围不住的围龙屋

记一个客家宗族的复甦

房学嘉 谢剑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1

ISBN 7-5360-3748-1

I. 围...

II. ①房...②谢...

III. 客家—传统文化—研究

IV. ①K281.1 ②K89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5899 号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梅县程江彩色印刷厂

(梅州市梅县程江镇)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7.5

字 数 200,000 字

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60-3748-1/K·57

定 价 (共两册) 4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Preface

Professors Fang Xuejia and Xie Jian (Hsieh Jiann) have given us an excellent, detailed study of a Chinese rural community but they are certainly not the first researchers to have done so. It is a single-surname community, yet even such a more limited form of village organization previously had been studied by scholars. What is unique and especially important about the community presented in this book is its characteristic form as a weilongwu or circular lineage compound, arranged in an architectural style notably characteristic of the Hakka heartland in the Meizhou area of northern Guangdong. This study relates space, architecture, and time to cul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a way most appropriate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weilongwu residential and communal arrangements. In its construction and layout a weilongwu proclaims itself to be a tightly knit group of patrilineal kin descended from a common ancestor. A weilongwu compound is a structure in progress, as the authors point out, reflecting the aspiration of those initiating construction for an ever-increasing posterity who will see to the compound's expansion into its largest possible mature form, when it will house a large lineage or lineage branch.

The Wen surname weilongwu compound that is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can certainly be considered a residential community in

its own right; indeed, weilongwu architecture places resident families into ongoing intimate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such that the boundaries defining different families become more permeable and fuzzy within the overarching weilongwu framework. At the same time, the Wen surname weilongwu is hardly in social isolation from surrounding settlements. As shown in great detail by the authors, the weilongwu is intimately connected to other settlements in terms of kinship ties, common territorial identification, and marketing arrangements, with all such ties given strong religious validation.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s the particular weilongwu containing the ancestral hall (and ancestral tablets) of Wen Renhou. Other weilongwu are linked in that they are without their own ancestral hall, even though their founders at some early point moved out of the Wen Renhou weilongwu and set up their own. So they return to the Wen Renhou weilongwu to worship. Yet other weilongwu have installed their own ancestral halls but share common patrilineal ancestors with those of Wen Renhou. While lineage branching or segmentation has been a classic theme in Chinese kinship studies, in this book we have a fresh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and growth of weilongwu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ways they relate to each other in terms of ancestor worship and genealogical connection on the other. The worship of she-gong or local deities contributes to defining local territorial communities incorporating weilongwu of different surnames and cross-cutting genealogical connections, such that various Wen

Preface

weilongwu, while tracing common ancestry, are affiliated with several such communities. Another set of connections between weilongwu is provided by marriage ties traditionally exogamous at the level of the surname. Further informing the complexity of traditional local society were its conflicts, and in this book the links and divisions forming local society are spelled out and analyzed in detail.

The story of the Wen Renhou weilongwu is carried through to present times such that this book is a richly detailed ethnographic description of changes in local life such as during the collective era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recent renewal of lineage ceremonial life and religion is part and parcel of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ism" as a major factor in present-day Chinese culture. Therefore, concern of Professors Fang and Xie with lineage, religion and kinship is hardly antiquarian but rather mark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our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Myron L. Cohen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March 24, 2002

序 论

房学嘉教授和谢剑教授对于一个中国社区的研究非常出色和详尽，当然他们并不是做这项工作的先行者，他们研究的是一个单姓社区，但是甚至于这样一个比较有限制性的农村组织形式以前也已经有许多学者探讨过。本书所展现的这个社区，其独特之处、十分重要之处，就是其围龙屋或者说宗族圈建筑。这种建筑形式在粤东北梅州地区客家聚居地非常有特色。本研究将空间、建筑、时间与文化和社会组织相联系，这种文化和社会组织同围龙屋的居住和社区环境是非常适合的。在建筑和布局上，围龙屋展示出它是同一祖先传下的紧密的父系血缘组织。正如作者所指出，围龙屋是可扩展的建筑，反映了开基祖希望子孙不断繁衍的愿望，子孙将看到围龙屋可以尽其可能地扩展，那时它可容纳一个很大宗族或宗支。

当然，可将作为本研究中心的温姓围龙屋视之为一个拥有自主权的居民区；实际上，围龙屋将各居住家庭置于一种不断发展的亲密联系之中，使得不同家庭之间的界线在围龙屋的框架内更加交错，更加模糊不清。同时，温姓围龙屋亦很少同外部环境隔绝。正如作者所详细描述的，围龙屋在血缘纽带、共同地域、墟市条件下同其它居民点存在紧密的联系，所有这些联系都是由强大的宗教力量所赋予的。

本研究的中心点是独特的包括仁厚温公祠祖堂（和祖宗牌位）的围龙屋。谈到其它的围龙屋是因为它们没有自己的祖堂，尽管它们的建造者在早期时移出了仁厚温公祠的围龙屋建造了自己的围

序 论

龙屋,所以他们回到仁厚温公祠的围龙屋祭祖。然而,一些围龙屋虽建造了自己的祖堂,但是与仁厚温公祠的子孙一起拥有共同的父系祖先。尽管在中国血缘研究中宗支或房系是一个古老的主题,但在本书中一方面我们可以对围龙屋的形成和发展获得一个全新的分析,另一方面也可看到围龙屋通过祖先崇拜和族谱将各宗支彼此联系起来。社官崇拜或地方神灵有助于界定包括了不同姓氏围龙屋的地方社区,切断宗族联系,所以各个围龙屋,尽管可以追溯到共同的祖先,都与数个这样的社区有联系。围龙屋之间的另一种联系是由婚姻纽带提供的,传统来说一般为异姓。进一步造成传统地方社会复杂性的是宗族冲突,本书对形成地方传统社会的链条与分裂进行的详细的描述与分析。

仁厚温公祠围龙屋的故事也是时代的展现,本书对当地生活的变化,诸如集体主义时代和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详尽的民族志描述。毫无疑问,最近宗族仪式和宗教的回复是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主义展现勃勃生机的一个部分。因而,房学嘉教授和谢剑教授所关注的宗族、宗教和血缘与其说是古代的,不如说是我们全面了解当代中国的文化变迁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

孔迈隆
於哥伦比亚大学
2002年3月

按:孔迈隆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序论原为英文,由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研究生李小燕翻译成中文。译稿经由孔迈隆教授亲自审阅。

序 论

70年代中期,笔者在新加坡从事博士论文的田野研究。因工作关系,偶访离岛之一的“无名”(Umin)岛,航途风浪甚大,海峡地带水流更是湍急。达到之后,但见景象荒凉,大概是谋生不易之故,岛上甚少居民,一座横额题名是“闽粤庙”的木造小屋,摇摇欲坠,似已久无香火。令人惊奇的是,离岸边不远处有一排整齐的木屋,虽人去楼空,但每家门前左侧都竖立着一块书明堂号的祖宗牌位,如陈姓的“颖川堂”之类。探询之下,得悉这是二战时来此避难的新、马客家人。当时生活极为艰苦,他们都是在岛上以捕鱼及种植蔬菜维生,勉强捱过战时岁月。这也是作者第一次接触客家人的事物,对他们那种坚苦卓绝的患难精神,和在流离生涯中仍不忘本的崇高美德,心生敬佩之意,也对这一族群及其文化发生兴趣。

之后,因作者任教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附近很多客家村落,当即申请计划,着手研究香港的惠州客家社团。到了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得以深入客家原乡之一的梅县从事人类学田野研究。本书之作,即是过去研究的部分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合作者房学嘉教授。房教授年轻有为,任教嘉应大学,本其对乡土之爱,全心全力投入客家研究,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而又勤奋敬业。本书如有所获,主要应归功于房教授,至于资料不够周全,甚至理论上的任何谬误,理应由笔者独负全责。

在研究工作进行过程中,得广东省梅州市嘉应大学及地方人

序 论

士之助，令工作得以顺利展开。稿成之后，交由笔者目前服务的台湾嘉义南华大学编译出版中心筹划出版发行，该中心负责同仁为此一再南北奔走，备极辛劳，而我校研发室助理陈美萍小姐代为核校两次，细心周到，均有助本书的顺利出版。谨志卷首，以表感谢之忱。

谢 剑

己卯仲秋于嘉义南华大学

序 论

时间真快,《围不住的围龙屋》由台湾南华大学出版至今已整整两年,并有幸当选全岛 2000 年百佳图书之一。惟因当时印刷和发行都在台湾,与梅县讯息来往不易,加上原始资料多存在梅县和香港两地,以致书中不免有些错缺,现在房学嘉教授加以校正和增订,使是书能更加完善。房教授为学勤奋,且办事认真,因此我深信是书在大陆再版必能获得学界的重视。

是书主要是以丙村温姓氏族的发展,反映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後至九十年代中的情况。本人忝为作者之一,为是书提供了写作架构和理论基础。除了陈述西方学界对民族复兴的两派主要意见,即经济论和结构论之外,更拓展了理论空间,从围屋的居住模式、五十年代後团队的工作组织,乃至社会的流动性等来思考问题。改革开放後农村经济活跃、氏族活力重视,但围屋与宗族合而为一的时代毕竟过去了,这也是书名《围不住的围龙屋》之由来,并在书末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下一步又将如何?

但愿未来终必有学者继续这一研究,也好为学界开展更广阔视野。

谢 剑

2002 年於台湾佛光大学

目 录

序 论.....	孔迈隆[1]
序 论.....	谢 剑[6]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生态体系.....	(8)
第三章 宗族简史	(13)
第四章 宗祠传统	(50)
第五章 社区结构	(69)
第六章 传统习俗	(92)
第七章 婚姻生育.....	(127)
第八章 生计变迁.....	(145)
第九章 宗族复甦.....	(182)
第十章 结论.....	(197)
参考书目.....	(204)
附 录.....	(209)
后 记.....	(225)

第一章 导 论

本书主旨,在探讨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广东省梅县丙村镇一个客家温姓宗族的变化。以 1949 年以来的时间演变为经,以重大事件,如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及改革开放等为纬,着重在政治、经济新政策之下,社会与文化巨变对温姓这一客家宗族的影响。将近 50 年来,有关政策有如钟摆从一端走向另一端,例如由高度强调集体主义意识的人民公社,趋向着重个人利益的包产到户,其间带给人们的变化是巨大的。对温姓宗族组织,举凡领袖制度、租佃关系、家庭结构、宗族礼仪、经济生计及因此而产生的职业分化等,必然会有极具意义的改变。例如以往某一时期,“宗族”一词视为禁忌,祠堂上的祖宗神位牌被下令销毁,代之以毛泽东像、毛泽东语录,甚至林彪像与林彪语录,以及诸如“为人民服务”、“忠”、“公”等口号。目前则是另一景象,宗族组织复甦,不仅成立了宗族委员会,修复祖公神位牌后并举行隆重的升座典礼。通过风水师的指引,整修宗祠和这座具有 400 多年历史的祖屋。与此连带的,是行业的迅速分化,除务农外,举凡开车、开拖拉机、养鱼、养鸡、养猪、种果、烧砖、办煤厂及其它经商活动都很普遍,这和往昔强调集体主义的人民公社,族人终日辛苦耕作,所得工分仅值两角钱的时代,构成强烈对比。本书并不满足于这类具体外表现象的描述及其数据,而在探求背后的深层意义。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什么条件之下,令原来早已被压抑甚或瘫痪了的宗族组织,再次复甦? 在功能上它对温姓宗族的成员有何作用? 带来了一些什么新的问题?

作者深深感觉到,强调平均意识的集体主义,对一个原本就是匮乏经济和重视有限之得概念(*Image of Limited good*)的古老民族而言(费孝通 1947; Foster 1965),只会更加深其固步自封和沦落消沉,失去主动积极的创造动机。像中国内地的许多农村一样,丙村的温姓宗族在历经一连串政治上所带来的折腾之后,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尽管只是政策上的些微放松,但却证明传统农村的宗族制度,并非某些人所想象的是现代化的障碍,反之却兼有可变性和适应力。换言之,存在于传统宗族制度的终极关怀和目的,例如宗族相助等精神,和追求进步的现代化过程是可以相容的。至少本书所研究的个案可以充分证明此点。

其次,以中国幅员之广大,人口众多,地域性亚文化之间的差异极大。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谚语即是这一现象的说明,甚至在同一政策之下,各地农村也会有不同的反应。因此,作者特别强调,本书所讨论的主要集中在广东梅县丙村的温姓宗族,在行文时当尽量避免诸如“中国的”、“华南的”或“客家的”这类概括性用语。虽然它和中国大地上所作的类似研究有共性,但它本身所展现的殊情尤为重要,如此才更有比较上的意义。

有关这一地区的文献资料,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丰富非常,但人类学的研究,一直等到八九十年代才开始。先是本书作者广东嘉应大学的房学嘉与香港中文大学的谢剑二人,在这一地区从事一般性的观察,之后再加入法国远东学院的劳格文(J. Lagerwey)。经选定丙村罗塘面上的温姓宗族及其所居的巨型围龙屋之后,谢、房二人决定合作在此从事一项人类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深入研究;劳、房二位则合作就这一地区的客家文化,做一全面和广泛的民俗学调查(劳格文 1996)。在策略上,这一设想的主要意义是避免见林不见树、或见树不见林的偏差。因为即以梅州地区来说,除了梅州市梅江区之外,尚有梅县、大埔、五华、兴宁、平远、蕉岭、丰

顺等县，要从事既深入又全面的调查研究，不是现有人力和财力所能支持的，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折衷办法。至于文献资料，除方志、学刊、族谱、碑铭、契约、借据、祷文等等之外，其它如政府出版物、社团专刊和私人笔记等都在收集之列。总之，作者为能突出事实真相，当尽可能利用所掌握的文献证据。

一、问题导向

首先，本书除一般民族志的资料之外，最关键的问题是从社会和宗教背景分析。温姓传统宗族制度的复甦情况究竟如何？例如祭祖礼仪的恢复、祠堂的重修、族谱的编撰，乃至于领袖制度的重组，其发生的过程怎样？在传统中国，士绅在地方政府和农村宗族组织之间扮演重要角色。20世纪50年代初期经由“土改”及“镇反”等一系列政策，已将传统绅权彻底推毁，然则今天复甦的宗族领袖制度组成的背景如何？当地干部的参与是否活跃？

其次，自80年代初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公社制度被废止，名义上说族人均可以家户大小向政府租赁不同面积的土地，包产到户，个人的积极性即受鼓励，行业的分化，以及社会的流动和层次化均会增加。这和宗族的复甦必然有关，例如在已无公有财产的情况下，宗族活动的经费来源如何？海外族人的赞助是否充实？宗族在复甦之后具有哪些功能？这些都是本书想探讨的。

第三，论者往往以单姓村及复姓村作为分析华南宗族组织的起点，例如M. Freedman(1958:1)就在其著作中开宗明义地说：“总之，在福建及广东省宗族组织与村落明显趋向合致，因此很多村落都是由单一的宗族所组成。”

另一位人类学者H·Baker(1979:49)，更予以规范化，例如说单姓村落都是由共祖男嗣拥有一片居地、公同财产及某一尊辈年

长族长。大概是根据这一极为“完整”的模式，人类学者 S·Potter (1990:262)更想象以往 40 年中无论是搞合作化还是公社化运动，都是以这种“宗族村”作为行政基础。因此，他认为“最低的行政和经济会计单位得以继续与传统父系族群(宗族或宗支)合而为一。这一集体在结构上继续是传统亲族群体的隐暗模式。也因此使得古旧宗族的深层结构得以延续”。是焉？非焉？或者一如另一位人类学者许烺光(Hsu 1968:580)所判断的，公社化之类的急进措施，“就是要减少亲族制度的力量，以便用快速组织和工业化来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换言之，宗族组织之类不但无从继续，且已被削弱或彻底推毁。本书就这方面予以探讨。

第四，D. Faure (1986:166)研究香港新界的宗族组织时，不仅将村落与宗族两个概念加以断然分划，并指出宗族亦无从取代“地域上的社区”(territorial Community)。后者往往是由数个宗族所构成，供奉共同的神祇。作者认为，所指应是俗民信仰形成的所谓“轮祀圈”，有别于宗族各自的祖先崇拜，成为农村社会生活中的动力。“文革”之后，庙宇已被破坏，供奉俗民信仰的神祇多已不复存在。本书将检讨在现况之下，祖先崇拜和俗民信仰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二、田野方法

本研究计划肇始于 1991 年春，之后断断续续，原因是希望先从一般性的了解开始，明白当地的大致情况。例如说行政建制、土地利用、人口规模、行业分化、产业概况、教育设施、对外交通、婚姻亲属、宗教祭祀以至于狭义的族群关系，都是作者深感兴趣的。因为以后者而言，即使梅州地区是俗谓的“纯客地区”，但在任何一个村庄都可能存在亚群之间的复杂关系，例如单姓村不同

房之间的、或复姓村不同宗族之间的抗衡与合作。这一工作尽管是浮面和未能深入的，却也是必需的。就因为作者之一是外来者，不但不是客家，并且长期“流落”海外，本身虽兼有中、西文化的背景，但对客家所知有限。他固然是一个理想的“文化中间人”(Cultural broker)，但面临历史意识极强，并以“中国性”(Chineseness)为荣的客家人及其文化，毕竟和非洲或拉美某些只靠口传而并没有文字史的族群不同，不能仅以现实的“剖面分析”(Cross-sechional analgsis)为满足，而必须结合历史。这也是何以作者认为对中国文史并无深度训练的外国人类学者，往往难于掌握中国的情况。例如 H · D · Baker(1979:3~10)认为贫穷是决定中国家庭组成的主要因素，并且仅凭想象作出贫穷导致普遍迟婚的错误论断；研究香港客家的 N · Constable(1994:1)在谈到香港华人的族群分类时就有观念不清的问题；A · wolf(1968, 1970)使用台湾地区“新抱”(即童养媳)被“送作堆”(即嫁与养父养母的儿子)，往往导致婚姻失败的个案，归因于自小的关系亲近形成情感上的嫌恶，但却忽视了中国社会的重视羞耻及因此而产生的对此类的“兄妹婚”的外在压力。诸如此类，真是不胜枚举。换言之，本书重视民族志研究的基本素材，但在人类学理论上作出任何推论时，当必考虑多元因素，并强调其局限性。

再从方法上说，丙村罗塘面上的温姓大围龙屋，即仁厚温公祠，所谓“四进三堂八横四围”，连同附近土地，似乎方圆自成体系。族人自豪地称以此大屋可以驻军一团，最盛时有族人近 400 人聚居于此。改革开放以来，原来很多住在大屋中的人因为发家致富，突“围”而出另在大屋之旁营造新居，但目前仍住有 300 多人。这一发展，为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这类基本方法固然提供了机会，更为历史重建和对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过程分析，提供了一个易于验证的实例。